

图九 北魏谭副造像背屏背面拓本

然，民知其义。又愿亡父」母舍此秽形，俱蹬（登）妙乐；慈氏初唱，愿在上首；」己身家眷，业障（障）云除；宿愆殄灭，挥慧刃以割」三流，远标八政。法仪诸人，高步灵觉，含生有」形，一时成佛。

北京、陕西及甘肃等地出土的铜、石造像及石窟寺中时常有见，较具代表性的有陕西兴平皇兴五年（公元471年）交脚弥勒像、河北安熹（今定州市）太和元年（公元477年）阳氏造铜佛像、内蒙古乌兰察布旗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僧安造铜佛像、美国大

三、相关问题的探讨

（一）图像与题材内容

谭副造像的图像内容丰富，特征鲜明。主尊体格健硕，颐肩细腰，身着覆肩式的通肩袈裟，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于腰侧挽持袈裟褶边。衣纹厚重，立体感极强，胸口处呈“U”形，腹下及臂膀处均呈蟹爪形勾连状，下摆处显露三重褶边。与该像姿态和袈裟样式、衣纹特征完全相同的是云冈第20窟左壁立佛^[4]（图一〇），而具有相同或类似衣纹的造像还见于云冈第17窟左壁坐佛、第20窟正壁坐佛^[5]及鹿野苑第6窟正壁坐佛^[6]，均为云冈一期昙曜五窟及稍后开凿的平城鹿野苑石窟中最具代表性的造像^[7]。此类极具特色的勾连式衣纹最早见于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高阳蠡吾（今河北博野）苑申造像^[8]，从题记和风格分析是古代河北地区五世纪以来传承和流布的造像样式^[9]。云冈石窟开凿之后，这种衣纹在今河北、内蒙古、



图一〇 云冈第20窟主尊及左侧立佛

都会博物馆藏北魏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弥勒铜像等^[10]，其时代集中在北魏皇兴至太和初年，下限一般不超过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由平城迁都洛阳。

左胁侍菩萨保存较为完整，其显著的特点是面相浑圆，五官紧凑，颈悬下垂各类小饰件的桃形项饰，肩腹间交叉缠绕穗状璎珞。类似的菩萨造型和装饰亦见于云冈第6号窟明窗两侧的半跏坐菩萨像^[11]，这种形象应来自河西地区十六国以来的石窟造像，其原型在今肃南金塔寺东、西窟及马蹄寺千佛洞第2窟的中心柱上尚有残存^[12]。

主尊项光内圈为宝装莲瓣纹，外圈为一周袒右和通肩袈裟相间排列的禅定坐佛。项光外侧下方雕刻两组双手合十、侧身胡跪的供养菩萨，上部为仰身持物的飞天形象。人物造型、服饰、姿态及组合方式均在昙曜五窟主尊和大型造像中常见，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是第20窟正壁上方主尊头部周边的雕刻图案^[13]。部分飞天裙摆呈鱼尾状覆裹双足的样式殊为少见，类似的做法也见于河北成安出土的北魏太和六年（公元482年）鞠抚造释迦像^[14]。

谭副造像背屏背面核心图像是弥勒菩萨

兜率天宫说法图。作为释迦牟尼的继任者，早期的阿含经典中不乏有关弥勒的记载，但其明确的图像，普遍认为要到贵霜王朝建立以后^[15]。弥勒是犍陀罗艺术最为常见的菩萨造型之一，通常身躯健壮，头梳高髻，唇上浓须，胸佩“U”形饰^[16]，交足坐姿兜率天宫说法组合像也时常有见^[17]。公元四世纪后龟兹石窟中弥勒说法图已成为重要的题材，主要分布在中心柱窟主室前壁门道上方的圆拱形壁面

上，交足弥勒头戴珠冠，身披串珠，两侧簇拥众多闻法菩萨和天人形象，在克孜尔第17窟、第38窟及第224窟等均可见到较完整的画面^[18]（图一一）。随着弥勒信仰的传播，河西和敦煌十六国以来的早期石窟及造像中也多见交足弥勒造型，如敦煌第275窟正壁交足弥勒彩塑^[19]，炳灵寺第169窟立姿弥勒菩萨^[20]，金塔寺和马蹄寺则多为佛装交脚弥勒^[21]。值得注意的是时代和特征都很明确的14件北凉石塔上都雕刻有弥勒菩萨，其特征为头戴花冠或珠冠，上身半裸，身披帛带，下着禅裙，绝大多数为交足坐姿，个别结跏趺坐或立姿^[22]。受西域和河西地区佛教文化因素的影响，云冈一期和二期洞窟大量出现交脚弥勒菩萨形象，主要分布在门道、明窗及洞窟侧壁^[23]。谭副造像背面的交足弥勒头戴珠冠，面相圆润，五官紧凑，身挂串珠饰，斜披络腋，十字花形臂钏，左手悬提细长颈净瓶，交足坐姿。除面相、冠饰、臂钏、串珠等明显具有西域特别是龟兹地区早期弥勒图像的普遍特点外，同时出现了斜披络腋，这是在龟兹和河西早期石窟中极为罕见，而在云冈一期造像中才较多出现的新特征^[24]。

在公元五世纪译出并流传的弥勒经典



图一— 克孜尔第17窟主室前壁弥勒说法图

中，帝释天、大梵天、龙王及飞天伎乐均为弥勒的护法诸天^[25]。帝释天与梵天原为婆罗门教神祇，分别具有“世俗之王”和“梵界之主”的神格，后成为佛教的护法主神，在公元前3~1世纪前半期的佛教美术初始阶段就已经出现^[26]。犍陀罗艺术中梵天和帝释天的图像较为多见，常成组出现在弥勒说法及相关的佛传故事画面中。梵天多为中老年婆罗门形象，头梳宽圆髻，袒裸上身或偏袒右肩，下着禅裙，象征皈依佛教的外道；而帝释天一般为王侯装束，头戴印度式缠头宝冠，颈悬项饰，身披帛，腕佩镯，下身着裙，象征世俗王权的归附^[27]。克孜尔石窟第14窟和第98窟主室右壁等处有梵天劝请佛传故事，第4、98、178、179、192、224窟左甬道外壁及第189窟明窗左侧和第207窟中心柱左壁上的升三十三天说法佛传故事中均涉及帝释天和大梵天^[28]，但其具体形象特征不很明确。而在第13、17、38、69、100、114、175及186窟县摩钵本生故事画中却有化现的帝释天和大梵天形象，帝释天均为菩萨装束，头戴宝冠，额上绘出第三只眼；而梵天则头挽大螺髻，身披白底、黑青色圈点条纹袒右横巾^[29]。河西地区最早确认的帝释天和大梵天形象见于武威天梯山第4窟中心柱正面北凉壁画，均为菩萨装，头戴宝冠，

胸颈佩饰，身披帛带，大梵天执拂尘，帝释天提宝瓶^[30]。特征最为鲜明的是炳灵寺第169窟北壁前部西秦至北魏时期的坐佛三身像，主尊为结跏坐佛，身着覆肩的通肩袈裟。右侧胁侍为大梵天，头梳高圆髻，菩萨装，袒上身，颈悬项饰，胸佩“U”形饰，肩披帛，左手执拂尘，下着禅裙，尚存犍陀罗艺术风格（图一二）。左侧胁

侍为帝释天，头束髻，身披高领甲冑，右手托金刚杵^[31]。类似的图像近年在敦煌及河西地区的张掖金塔寺、南山千佛洞、文殊山十六国至北魏时期的造像和壁画中辨识出多幅，其普遍特征为帝释天束髻或着冠，身披铠甲作武士装，手执金刚杵；大梵天为束髻菩萨装或僧人装，手执拂尘^[32]。关中及中原地区的石窟造像中目前尚无明确的帝释天与大梵天组合，有学者依据部分造像中胁侍菩萨手执拂尘的特征，推断中原北方及南朝部分造像中存在帝释天和大梵天的组合，立论尚需进一步探讨^[33]。北吴庄出土谭副造像背面的弥勒说法图中帝释天和大梵天形象有明确的题记，梵天头梳高髻，戴化佛冠，菩萨装；帝释天头戴羽冠，身披铠甲，甲片及甲装的披覆方式与中原魏晋至北魏时期的铠甲差异较大^[34]，而与克孜尔石窟中降魔成道及八王分舍利场景中的甲装类似^[35]。谭副造像中的帝释天和大梵天形象除承袭犍陀罗的传统文化因素外，明显具有河西地区帝释天和大梵天的造像特征，是探讨中原北方地区同类题材的标型器。

难陀和跋难陀龙王是护法龙神之上首，传有七头，为佛陀弟子大目犍连降伏，相关行迹见于多种佛经记载^[36]。龙王形象在公元二世纪后的秣菟罗艺术中就有较多发现^[37]，



图一二 炳灵寺第169窟帝释天与大梵天

多见于佛经故事中，项光中通常雕出七条蛇头。克孜尔第193窟主室前壁门道西侧绘有一幅立姿龙王，披发戴冠，身着甲冑，头顶上方有四条蛇形龙^[38]。谭副造像中的难陀和跋难陀龙王形象相似，均头梳扁髻，肩披帛，斜披络腋，下身着禅裙，舒腿坐于束腰藤座之上，头后雕出五至六条曲颈弓身长蛇，尚存古代印度龙王特征。

弥勒说法图上方的飞天均梳扁髻，裸上身，肩披帛，斜披络腋，下着长裙，发型和姿态与永靖炳灵寺第169窟西秦壁画中的飞天相近^[39]。说法图下方分栏浅雕姿态各异的舒腿坐伎乐和舞者形象，在云冈石窟的伎乐和供养天人形象中已较常见^[40]，类似图像亦见于现存碑林博物馆的北魏皇兴五年（公元471年）造像背面，其姿态和形象特征与北凉石塔基座上的部分供养天人或护法天人颇有相近之处，根源似可上溯到中亚西亚地区的乐舞形象。

谭副造像正面和背面均有世俗供养人形象，头覆皂巾，身着交领窄袖袍服。男性单髻，腰束革带，下悬多组饰件，下身着裤褶；女性双髻覆巾，下着褥裙。此为典型的拓跋鲜卑装束，亦即文献中所记的“垂裙皂帽”服饰^[41]。类似的供养人形象在云冈一

期的昙曜五窟中有大量发现，但在云冈二期的洞窟中，世俗供养人列像相对少见^[42]。另外在山西大同发掘的五世纪中期前后的北魏墓葬也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对比图像，如大同沙岭太延元年（公元435年）M7出土壁画和漆皮彩画^[43]，大同南郊北魏墓群五世纪中期M229棺板残存的人物形象^[44]，雁北师院北魏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宋绍祖墓出土陶俑^[45]，石家

寨北魏延兴四年（公元474年）和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入葬的司马金龙夫妇墓出土的Ⅰ式、Ⅱ式女俑和女乐俑^[46]，以及智家堡北魏平城时期的墓葬棺板绘画^[47]，都可见到这种以“交领窄袖”、“垂裙皂帽”为主要特征的鲜卑服饰，其时代集中在北魏太武帝太延年间至孝文帝太和改制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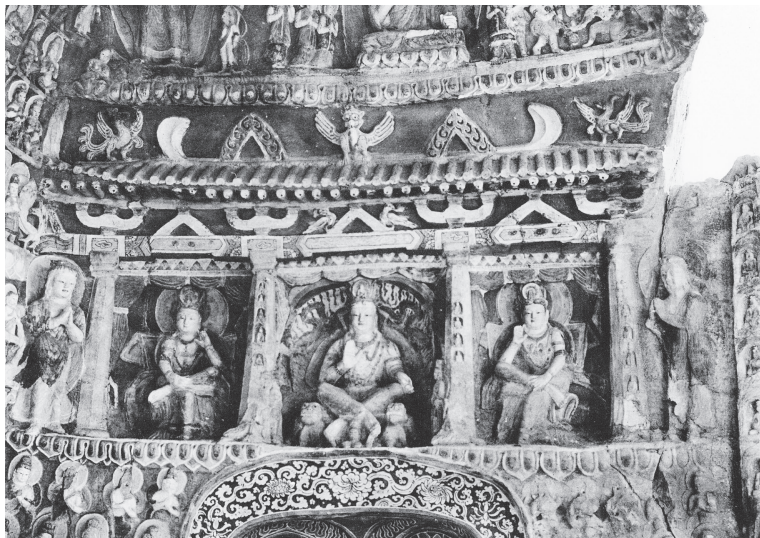
（二）建筑与装饰图案

谭副造像背面的殿堂将古代印度建筑中的塔刹与中国的高台楼阁有机结合在一起，这种上设多层相轮、下置重楼阁道的“堂阁周回”式建筑最早见于三国时期笮融起浮图祠的记载^[48]，实物则有新近湖北襄樊菜越三国吴墓出土陶楼为证^[49]，与之相近的单层木塔图像在北魏至隋唐以后的敦煌^[50]、吐鲁番^[51]等地石窟壁画中亦常有见，应该是融汇中印建筑风格的早期单层木构佛塔的一种表现形式。

作为单层木塔主体的殿堂部位，从下部的台基、踏道、勾片栏杆至中上部的檐柱、额枋、斗拱以至于顶部的瓦垄、正脊、鸱尾等均为中原传统的土木梁架结构。五世纪中期前后的北魏墓葬中也有近似的建筑实物和模型出土，但结构更为简单^[52]。类似的实例在云冈石窟中有多处发现，保存最好的是第12窟前室东壁和西壁上层的交足弥勒龕^[53]，

两者对比不仅屋顶、斗拱、额枋、梁柱及勾栏等结构近似，屋脊和梁架间一些非结构性的衔忍冬枝叶的勾喙鸟的做法也十分雷同^[54]（图一三）。另在云冈第9窟、麦积山第28窟及龙门古阳洞外立面均残存类似的建筑样式^[55]。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谭副造像中发现了一些新的建筑因素，如正面重栱的样式，虽然可以上溯到河北望都东汉晚期墓出土的建筑模型^[56]，但在北朝建筑实例和图像中尚属罕见。而类似于昂的建筑构件，更是仅见于三国时期的文献^[57]，具体的实物和图像资料目前只发现于唐宋以后的建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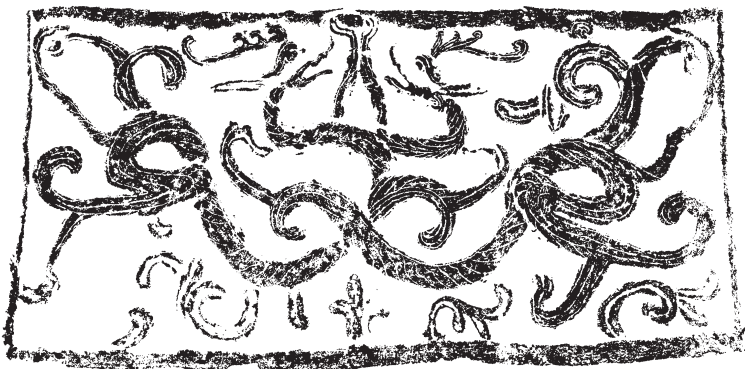
谭副造像上的各类装饰图案均可在云冈一期、二期石窟及同时代的墓葬中找到相应的对比材料。背屏正面外缘的火焰纹与云冈第17窟东壁坐佛及第20窟东壁立佛背屏上的火焰纹做法一致^[58]，背屏边缘的细长连续三叶忍冬纹及莲花图案更是云冈石窟及太和初年北魏墓葬中最为常见的装饰纹样^[59]。主尊脚下底座上浮雕的体躯纤细、窄首长角的交龙图案亦见于云冈第12窟主室门拱上方^[60]（图一四；图一五），而类似的龙的形象多见于龕楣及须弥山上^[61]。世俗供养人身前的博山炉式香炉样式在云冈第10窟门道顶部有见^[62]。而在谭副造像



图一三 云冈第12窟前室东壁浮雕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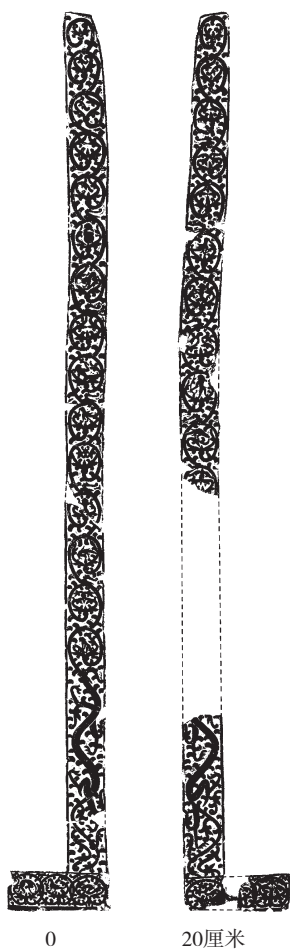


图一四 北魏谭副造像主尊足下龙纹



0 50厘米

图一五 云冈第12窟主室门道上方龙纹



图一六 北魏谭副造像背屏
侧面拓本

底座侧面连续忍冬装饰纹带内饰童子像（图一六）在云冈石窟亦较常见，如第10窟门道东、西两侧^[63]；另在司马金龙墓出土石雕柱础方座上雕刻的忍冬伎乐童子图案，与谭副造像上的同类图案在构图和雕刻技法上几无二致^[64]。

（三）造像的地域、时代与风格

造像题记记载像主谭副为发干县人，另在正面供养人题记中有魏郡魏县及邯郸县。发干县位于今山东南冠县境内，时属阳平郡，邯郸县和魏县地当今址，时属魏郡。按北魏天兴四年（公元401年），以邺为治所设相州^[65]，下辖魏郡、阳平、广平、汲郡、东郡、顿丘、濮阳和清河等郡^[66]，据此可确

认造像主及相关人物均为邺下人氏。

谭副造像造型精美，文化内涵丰富，主尊样式上承古代河北地区的传统，弥勒及护法诸天具有强烈的西域和河西佛教因素，建筑式样融合中印古代塔、殿的特点，供养人的服饰反映了北方鲜卑游牧民族的特色。与之情况类似时代最晚的一件造像是邺城遗址早年出土的大代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造释迦像^[67]，其造像特征、构图方式和建筑结构谭副造像具有较多的相似性。

简而言之，谭副造像的总体风格是在北魏定都平城，统一中原北方地区，汇聚东、西方文化因素而创立了云冈模式之后^[68]，受其影响而出现的造像样式。虽然造像题记起首部位残损，纪年处仅见“五日辛丑”，但行文中皇帝与太子并提可以为断代提供一定的线索。按北魏自五世纪中期以后，皇帝多幼年即位，与谭副造像年代相符且册封有皇太子的时代只有两个时间段，其一是北魏献文帝皇兴三年（公元469年）立拓跋宏为太子，延兴元年（公元471年），献文帝禅位，年仅5岁的拓跋宏即位，是为孝文帝^[69]。其二是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立皇子询为太子，三年后废询为庶人，次年（公元497年）立皇子恪为太子，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太子元恪即位，是为宣武帝^[70]。综合主尊体形、袈裟样式、雕刻手法及菩萨、飞天和背屏上的弥勒说法图像、供养人服饰、装饰图案等因素，对比五世纪中期的北魏石窟及墓葬出土材料，可以确认谭副造像与太和改制前的云冈一期及二期前段至迁都洛阳前后北魏石窟和造像的各项特征均相符合^[71]，故其雕造时代当为公元五世纪后半段的北魏皇兴至太和年间^[72]。

附记：造像录文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超研究员审阅核校，在此谨致谢忱！

注 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河北邺城

- 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与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考古》2013年第7期。
- [2] 何利群：《从北吴庄佛像埋藏坑论邺城造像的发展阶段及“邺城模式”》，《考古》2014年第5期。
- [3] “知财五家，身难常保”，出自刘宋僧伽跋摩所译《劝发诸王要偈》“知财五家分，无常不牢固”（参见《大正藏》卷32第748页）。
- [4]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十四卷図版15，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4年。
- [5]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十二卷図版43，第十四卷図版6，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4年。
- [6] 李治国、刘建军：《北魏平城鹿野苑石窟调查记》，见《云冈石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1年。
- [7] 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 [8] 石松日奈子著，筱原典生译：《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第46~50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 [9] 李玉珉：《河北早期的佛教造像——十六国和北魏时期》，《故宫学术季刊》第一卷第四期，1994年。
- [10] 陈悦新：《5~8世纪汉地佛像着衣法式》第130~13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 [11]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三卷図版4、5，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5年。
- [1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西石窟》图五六、七八、八十、一三三等，文物出版社，1987年。
- [13]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十四卷図版7，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4年。
- [14] 邯郸市文物研究所：《邯郸古代雕塑精粹》图39，文物出版社，2007年。
- [15] 宫治昭著，李萍、张清涛译：《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第297~300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 [16] W. Zwalf, *A Catalogue of the Gandhāra Sculpture in the British Museum*, vol. 2, Plates 50-75,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6.
- [17] 栗田功：《古代佛教美術叢刊:ガンダーラ美術》II佛像，図版37、38、43-48、50、53，株式會社二玄社，1988年。
- [1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至三卷），第一卷图版57、84，第三卷图版222，文物出版社，1997年。
- [19] 樊锦诗等：《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见《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82年。
- [20]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第255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 [2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西石窟》图六、四三、六四等，文物出版社，1987年。
- [22] 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第81~96页，財團法人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2000年。
- [23]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十一卷図版70、76，第十二卷図版13、27、28、42、61、84、95、99，第十三卷図版2、3、4、7、66、67、71、72、76、79、87、89、90、107、122，第十四卷図版29等，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3~1954年。
- [24] 斜披络腋的典型样式未见于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新疆龟兹石窟中偶尔有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克孜尔谷内区第114窟主室中心柱正壁龕内弥勒坐像及第110窟主室左壁前端的禅修菩萨像；河西早期石窟中亦不多见；云冈一期及之后开凿的洞窟中大量出现。
- [25] 参见[刘宋]沮渠京声：《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尔时兜率陀天上，有五百亿天子，一一天子皆修甚深檀波罗蜜。为供养一生补处菩萨故，以天福力造作宫殿。……五百亿龙王围绕此垣，一一龙王雨五百亿七宝行树，庄严垣上。……时十方百千梵王，各各持一梵天妙宝，以为宝铃悬宝帐上。……时诸阁间有百千天女，色妙无比，手执乐器。……四部弟子，天龙八部，闻佛所说，皆大欢喜，礼佛而退”，见《大正藏》卷14第418-420页；[姚秦]鸠摩罗什：《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弥勒菩

- 萨)坐于龙华菩提树下。……尔时诸天龙神王，不现其身而雨华香供养于佛。……弥勒佛既转法轮度天人已，将诸弟子入城乞食。无量净居天众恭敬，从佛入翘头末城。当入城时，现种种神力无量变现。释提桓因与欲界诸天，梵天王与色界诸天，作百千伎乐歌咏佛德，雨天诸华梅檀末香供养于佛。街巷道陌，竖诸幡盖。烧众名香，其烟如云”，见《大正藏》卷14第424~425页。
- [26] 宫治昭著，李萍、张清涛译：《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第175~177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 [27] 栗田功：《古代佛教美術叢刊：ガンダーラ美術》I佛伝，図245~267，part 2，VII-X；II佛像，図6、38、53，株式会社二玄社，1988年。
- [28] 丁明夷、马世长等：《克孜尔石窟的佛传壁画》，见《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7年。
- [29] 姚士宏：《克孜尔石窟壁画上的梵天形象》，《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
- [30] 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天梯山石窟》第92~94页彩版四二、四四、四五，文物出版社，2000年。
- [31]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图62、63，文物出版社，1989年。
- [32] 张宝玺：《河西石窟以大梵天帝释天为胁侍的造像》，《敦煌研究》2016年第4期。
- [33] 衣丽都：《邯郸成安县出土的北魏太和六年释迦三尊像》，《敦煌研究》2012年第3期。
- [34] 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第36~4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 [35] 贾应逸、非青：《新疆壁画线描精品》图75、103，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
- [36] [东晋]瞿昙僧伽提婆：《增壹阿含经》，见《大正藏》卷2第703~705页。
- [37] 東京國立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日本經濟新聞社：《インド古代彫刻展》図32，日本經濟新聞社，1984年。
- [3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第三卷图版89，文物出版社，1997年。
- [39]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图38、39，文物出版社，1989年。
- [40]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十二卷図版50B，第七卷図版47，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2~1954年。
- [41] 《魏书·辛绍先传》第1025页，中华书局，1974年。
- [42]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十一卷図版51、70、74B、86，第十二卷図版35、37、84、89，第十三卷図版67、75、76、90、112、116，第三卷図版61B，第八卷図版17、24、30等，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1~1955年。
- [43]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0期。
- [44]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第316~320、501~503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 [4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7期。
- [46]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图一五、一七、一九、二〇，《文物》1972年第3期。
- [47] 刘俊喜、高峰：《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画》，《文物》2004年第12期。
- [48] 参见《三国志·刘鹞传》第1185页（中华书局，1959年），“笮融者，丹杨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漕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
- [49]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樊樊城菜越三国墓发掘报告》图九、图版陆，《考古学报》2013年第3期。
- [50] 参见萧默：《敦煌建筑研究》第146~149页图4-1、4-2；第164、165页图4-22-1，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
- [51] Albert Grünwedel, *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 fig.135-136, München, 1906.
- [52]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

- 群》第78~87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 [53]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九卷図版9~13、16~19,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3年。
- [54] 梁思成等:《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见《梁思成全集》第二卷第177~211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 [55] 傅熹年:《麦积山石窟中所反映的北朝建筑》,见《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 [56]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第75~78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
- [57] 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见《梁思成全集》第七卷第33页,“何晏《景福殿赋》:飞昂鸟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 [58]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一二卷図版45,第一四卷図版16,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4年。
- [59]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第100~102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 [60]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九卷図版44,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3年。
- [61]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三卷図版78,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5年。
- [62]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七卷図版26、30,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2年。
- [63]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七卷図版27~29,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2年。
- [64]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图六,《文物》1972年第3期。
- [65] 《魏书·地形志二》第2456页,中华书局,1974年。
- [6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一八第3719页,中华书局,1956年。
- [67] 郑绍宗:《河北临漳出土石刻造像记》,见《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庆祝会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3年。
- [68] 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见《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
- [69] 《魏书·显祖纪》第128、129页(中华书局,1974年),“(皇兴元年)秋八月,白曜攻历城。丁酉,行幸武周山石窟寺。戊申,皇子宏生,大赦,改年。……(皇兴)三年……六月辛未,立皇子宏为皇太子”。
- [70] 《魏书·高祖纪下》第172、179、180页(中华书局,1974年),“(太和十七年)立皇子询为皇太子。……二十年,……废太子询为庶人。……二十有一年春正月丙申,立皇子恪为皇太子”。
- [71] 同[7]。
- [72] 北魏献文帝立太子期间为公元469~471年,此时段符合“五日辛丑”的唯有北魏皇兴三年(公元469年)十月初五日。另“五日辛丑”前残损部位未见明显字迹,即使有“十”或“廿”字,“十五日辛丑”或“廿五日辛丑”均在拓跋宏被册立为太子至即位的皇兴三年(公元469年)六月至延兴元年(公元471年)八月的时间段之外。孝文帝立太子期间为公元493~499年,此时段符合“五日辛丑”唯有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八月初五日,另有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十二月廿五日,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五月十五日及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三月廿五日符合“□五日辛丑”。参见方诗铭、方小芬:《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第356、362、36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

(责任编辑 黄卫东)

本期要览

河南淅川县下寨遗址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简报 2008年11月至2013年7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下寨遗址进行了持续性的考古发掘。在该遗址清理仰韶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墓葬133座,出土陶器、玉器、石器、蚌器等152件。这批墓葬为认识丹江口地区的古代文化面貌和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新的资料,特别是乙类墓的发现为探索腰坑葬的起源提供了线索。

蒙古国后杭爱省乌贵诺尔苏木和日门塔拉城址发掘简报 2014~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和日门塔拉城址进行考古发掘,清理了I号城址的中心土台IA和II号城址的中心土台IIA等遗迹,出土陶片、铜刀、铜扣、铁刀等遗物。该城址为匈奴时期建造,具有浓厚的宗教礼仪氛围,或为重要的祭祀场所,极有可能就是史籍中记载的“龙城”所在地。

新疆奇台县唐朝墩城址2018~2019年发掘简报 2018~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等连续两年对唐朝墩城址进行考古发掘,清理了唐代、高昌回鹘和蒙元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发现城墙、城门、浴场、墓葬等遗迹,出土陶器、瓷器、铁器、铜器等遗物。该城址的发掘对研究天山北麓唐至蒙元时期多民族大一统历史格局的形成及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价值。

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比较研究 石峁和陶寺是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极为重要的两大遗址,均具有早期都邑性质。综合分析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并结合多学科研究成果,初步探讨了两者的关系,认为石峁和陶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不尽相同。非常重要的是,陶寺文化中晚期受到石峁遗存的影响非常大,甚至产生了不同面貌的考古学遗存。

邺城遗址出土北魏谭副造像图像考释 造像主谭副为邺下人氏,所造释迦像的制作时间为公元五世纪后半段的北魏皇兴至太和年间,是邺城地区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佛教石刻造像之一。造像工艺精湛、造型精美、色彩绚丽,图像题材多样,发愿题记内容丰富,时代特征显著,是研究北魏中后期佛教崇拜理念、图像样式、造型艺术乃至古代建筑及装饰的重要资料。